

## 海上画派产生的背景及特色形成的因素

彭西春

海上画派是我国近代绘画史上重要和颇具影响力的艺术流派之一，它以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的写意花鸟和人物画为主体的新画风，与正统派陈陈相因的复古画风相抗衡，冲破了元明以来的框范，将中国绘画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入侵，清朝统治岌岌可危。衰朽腐败的清政府，早已不复往日气象，宫廷绘画随之式微，宫廷山水画和宫廷花鸟画与走向衰落的人文绘画合流。文人正统绘画则染上“颓古之病”，因循守旧，失去活力。列强打开了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沿海通商口岸，客观上也将西方的物质文明、科学技术和文化大量输入，使中国画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鸦片战争之后的海上画坛，因发达的商业经济的刺激而呈现出繁荣兴盛的局面。来自全国各地在上海卖画的画家们，师承各异，风格流派不同，使海上画坛呈现出百花齐放，丰富多彩景象。其中最具时代风采和代表性的正是独树一帜的海上画派（参见薛永年、杜娟《中国绘画断代史·清代绘画》）。

### 一、社会经济的繁荣

任何艺术的变革和发展，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海上画派的发展和成熟，固然与艺术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有关，但与近代上海的崛起也是分不开的（参见丁羲元《任伯年艺术论》）。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根据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宣布开埠。上海县城西北至黄浦江与吴淞江的汇合处有一大片涨滩，其中吴淞江畔一带直至1850年还在汛期的江水中。然而，正是这片芦苇萋萋、白鹭出没的涨滩被英国殖民者看中，首先在此设租界，以后美国、法国竞相“租借”，形成了英美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十里洋场弥漫着奢靡淫猥之风，充塞着奸诈掠夺之徒，上海沦为帝国主义者掠夺中国财富的滩头阵地和冒险家的乐园。1853年，英国率先在上海设立麦加利银行，接着外国银行

诸如丽如银行、汇丰银行等纷纷进入上海，拥有大量银元，外国的银行“因之成了洋厘行市的最大操纵者，扼住了上海金融的咽喉”（参见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由于鸦片买卖，洋货倾销，加之清政府赔款，大量白银外流，物价飞涨。本土织布、船运业受洋布、洋船之打击，纷纷减产或破产，各地失业者纷纷涌入上海，其中广东和福建人即达十三万之众。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1853年上海小刀会奋起响应，各地官绅商贾纷纷逃到租界避难。据史籍记载，上海租界的人口原为两万，1862年至1895年三十三年间猛增到近百万。大批外国冒险家和国内各地富豪带来了大量资财以及古董书画。同时，上海由于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又具靠近丝绸茶叶产地、扼守中国海陆运输的中心的特殊地位，列强纷纷将掠夺的重点从广州移至上海，上海迅速成为各国资本控制下的远东商业中心。而上海又是清政府的经济命脉，每年冬天由上海启运漕米，是供应京城及周边地区的重要物资，而上海的关税收入成了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军饷的主要来源。上海的崛起加之晚清运河的淤塞，曾经繁华的商业中心苏州渐渐衰落，出现了“江浙东南半壁无一片干净土，而沪上繁华远逾昔日”的景象（参见王韬《瀛壖杂志》）。上海，一个渔村荻港，鸦片战争后一跃取代了苏州、扬州和广州的经济地位。

上海成为通商口岸，逐步发展为国际化大都市，经济与文化的发达程度均远胜于扬州等地。据统计，1843年11月至12月，上海进出口总值为580,901两，而至1857年则已激增至49,207,828两（参见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统计数字均未含鸦片贸易）。上海已成为中国乃至远东最繁华的商业城市。近代上海的崛起，不像其他一些城市主要是依靠政治地位的变化。事实上，鸦片战争前后上海的政治地位并无明显改变，甚至可以说基本保持不变。经济的发展是促使上海成为中国第一大都市的根本原因。在经济因素中，商业贸易又是最重要的因素。西方研究者指出：“这个城市不靠皇帝，也不靠官吏，而只靠它的商业力量逐渐发起来。”（霍塞《出卖的上海滩》）

上海这种独特的发展之路和独特的社会构成,是海上画派产生的主要背景,也是其风格形成的根本原因。

## 二、多种文化的交融

上海经济的迅速发展,吸引了以南方为主的各地画家,各路画坛高手云集沪滨,各展其才,使上海成了继扬州之后的又一画坛中心。其情景如张鸣珂在《寒松阁谈艺琐录》中所说的:“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于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于而来,侨居卖画。”据黄协坝《淞南梦影录》载:“各省书画家,以技鸣沪上者,不下百余人。”而据杨逸在《海上墨林》中的记载,则已由百余人激增至数百人,如加上当地的书画家,人数就更多了。其中趣味相投者,互结画社,各呈所长,一时蔚为大观。张熊、任熊、赵之谦、胡公寿、虚谷、任薰、任伯年、蒲作英、钱慧安、吴昌硕等名家云集上海,为海派绘画特色的形成提供了雄厚的人才基础。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层面的画坛画艺,成了上海画坛迅猛发展的艺术酵母。上海所营造的绘画盛况,使帝国之都北京也为之黯然失色。

海上画派乃是对上海地区诸多绘画流派的统称,通常指晚清活动于上海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市民审美趣味的职业画家群体,它形成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海上画派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上最具魅力的艺术景观之一。作为与京津画派、岭南画派鼎足而立的画家集群,它不仅以画家阵容庞大、绘画风格纷繁雄踞魁首,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它那追蹑时代步伐的革新姿态以及得中西交汇风气之先的优势和对中国画坛深远的影响。

海派文化以本土文化、尤其是江浙文化为主体,除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外,主要还是根植于中华传统土壤的本土文化。上海的本土文化其实并不是封闭的地域文化,而是由全国各地,特别是周边的江浙地区涌到这里淘金的移民带来的多种传统文化的综合体。海上画派和当时或者先后出现的其他画派有着很大的不同,其人员就地域而言是非常宽泛的。早期海上画

派的一些代表人物,他们的前半生都不在上海,所以海上画派最基本的特色是海纳百川。正是这一特点,使当时的海派绘画突破了文人画孤芳自赏的状态,具有了市场化和大众化艺术的特征。

上海这个由小渔村发展起来的移民城市,独特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环境,迫使上海受到了多地域、多民族和多种文化的熏陶。正是多种文化的融合,铸就了海上画派强大的生命力。

## 三、西方文化的渐入

海上画派另一个有别于其他画派的特点,是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主要的是西方文化。当时的英国、美国、德国、俄国甚至“去亚洲化”后的日本文化都对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东西方文化的注入,使上海的文化来源相当丰富。

1800年至1840年出生的中国画家,如费丹旭、任熊、赵之谦等,都经历了鸦片战争和上海通商口岸的开放过程。伴随着口岸开放特别是传教大门的敞开,西方文化如洪水一样涌入上海。内有各地文化的汇聚,外有西方文化的影响,上海成为传统文化与西风东渐的交汇点。这种主要由江浙移民文化组成的本土文化传统,在资本主义经济大潮的荡涤后与西方文化交汇融合,形成了一种富于海派文化精神内涵的海上画派。

总而言之,清末民初的海上画派,其形成的社会背景是上海的崛起,各地艺术家的汇集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决定了其有别于其他画派的特性。海上画派一扫当时画坛的摹古沿袭风气,同时,这一艺术潮流代表着近代海上绘画的主流和方向,从而奠定了它在中国美术史上的特殊地位,对近代中国美术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 河南大学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 韦平